

毛泽东诗词与其内心世界及政治生涯

於仁涵

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影响之大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因此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正如 Vienna 大学举办这次会议的宗旨。

本文所研究和探讨的是毛泽东的诗词与其内心世界及政治生涯的联系。

要讨论研究这个课题，我们首先要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发展轨迹和文化渊源个性做一个简要的概括。

毛泽东从小是一个有个性的农家子弟，性格倔强极端，十岁时就从规矩森严的私塾逃学，十三岁为反抗父亲用跳池塘相威胁。(这件事可以看出毛泽东从小就很有斗争策略：从毛泽东喜欢非常游泳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断定毛泽东在当时已经会游泳，用跳池塘威胁父亲，既起到了威慑作用，又为自己留了万一自己不得不跳下去不至于被淹死的路。)毛聪明好学，少年时期在私塾里读书虽不喜欢，但仍“熟读经书”，更爱看“造反的”中国旧小说。年青时代的毛泽东对泡尔生的《论理学原理》极感兴趣，曾在本书上写下一万两千多字的批注。泡尔生的理论对毛泽东影响至深。尤其是毛泽东在注解中对伟人的评述，形成了毛泽东帝王思想的萌芽。1919年毛泽东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自称从1920年夏天，他“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毛泽东自称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毛有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学术界尤其是国内学术界一直有争论。我们从这一争论最直接的证人证据来做分析：持毛没有读过《资本论》的一方重要的证人有师哲，田家英，李锐这些毛身边的人，有在延安时期担任图书馆主任的于光远（《党史笔记》何方），尤其重要是毛泽东自己在1949年访问苏联时通过师哲翻译亲口向莫洛托夫承认他没有读过《资本论》（《莫洛托夫访谈录》丘耶夫）。持毛读过《资本论》的一方证人有从1954到1966年当毛秘书的林克（见《说不尽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1966-1976年任毛图书管理员的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无论从证人的质量还是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和证人提供证据的时间段来分析，毛泽东在1949年之前应该没有读过《资本论》，1949年以后很有可能读过，但毛并没有把《资本论》当回事，中译本《资本论》两百多万字，一千两百页左右，没见毛有什么批注。毛当然也读过马列主义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观念和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一直体现他的毛泽东思想里，但还是没见毛有份量的批注。反观二十四史3213卷共四千万字，毛熟读批注两千多页四千多字，毛还自称读了《资治通鉴》十七遍，毛泽东圈点批注诗词曲赋不下1590首。毛泽东在他的著作，讲话和与别人交谈经常信手拈来引经据典，但主要是引用中国古代经典和历史故事。再看毛本人亲自圈定的在1949年后生前正式发表在报刊杂志的诗词有三十七首（《毛主席诗词》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1976年元旦《诗刊》增加发表了另外两

首，共为三十九首。毛身后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有 67 首。官方发表的这 67 首毛泽东诗词中，除了毛泽东生前自己不准发表，毛泽东身后被编入副编的《杂言诗 八连颂》（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这首半文半白的诗外，没有一首真正形式上的白话诗，可见毛在诗词的艺术形态上丝毫不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从上述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毛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偏爱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应该说毛泽东是从一个由中国传统文化夹带近代西方思想包括马列主义熏陶出来的革命者，成长为继承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专制独裁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统治权利超越了中国历代任何一个帝王。（我们在分析以上的数据时，把毛泽东年青时代对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的批注调整到（scale）较次要的位置，因为这是毛泽东早期的学生时代的读书笔记，然而毛对泡尔生理论的某些理解还是影响了毛的一生。）

毛泽东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可以说读中国古典诗词是他读书生涯中除了读中国史书外的第二个偏爱。他对 1590 首古代诗词的批注，他自己也写下了一百多首古体诗词，可见毛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喜好和用中国古典诗词形式表达内心世界的愿望。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的是，毛从青年时代就十分重视舆论与宣传的作用，他很清楚舆论与宣传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一定是自己真实的观念，现状和目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许多公开发表的文章著作冠冕堂皇的语言掩盖了事实的真相。举一个例子，中共在 1934 年长征前夕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多年后，毛泽东在与毛远新谈话中自己承认：长征是“红军被迫撤离，说是北上抗日。对外宣传这么讲，实质上是逃命。不走就要被国民党吃掉了。”这些实话是毛一直到 1971 年以后年才对毛远新私人谈话中说出口。毛泽东又是个极其谨慎的人，他在五十年代出版《毛泽东选集》时，特意要求斯大林派一个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作为驻中国大使，替他的《毛泽东选集》把关（见《毛泽东：真实的故事》Alexander V. Pantsov & Steven I. Levine）。他对他的诗词也是如此，在他的《毛泽东诗词》单行本出版前，毛泽东自己改了又改不说，还专门印了一个征求意见本，在钓鱼台召开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袁水拍等二十多人的会议，讨论修改意见（见《臧克家与毛泽东诗词》臧小平）。如果说毛泽东请苏联大使尤金过来替《毛泽东选集》把关体现了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毛泽东心思缜密，考虑周全的精明手段：讨好了斯大林，又避免了给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话语权的斯大林在《毛泽东选集》中“抓辫子”的可能，同时也显示了毛泽东对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不自信，那么在他诗词出版这件事上，更显示了作为自信政治家的毛泽东对作为诗人的不自信。没有听说过哪位大诗人要开会研究修改自己即将发表的诗稿的。

研究毛泽东诗词是研究毛泽东的渠道之一。通过对毛泽东诗词的考证分析有时候可以发现宏观纵述的论证中所忽略的细节和真相。纵观毛泽东诗词，绝大多数都与其政治和革命生涯有直接关系，这些诗词或多或少地折射出毛泽东彼时彼刻的政治生涯，记录了彼时彼刻的历史事件。诗词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无疑是诗人的思想，感情，意识，理想的一种表现渠道。由于诗歌的表现形式不同于政治文章，毛泽东虽然对自己发表的作品极其谨慎，但毛的诗词与其政治著作相比，还是会无意中流露出更多的内心真实观念，性格特征，情感，语言习惯和揭露一定的历史真相。

许多毛泽东传记把诗人的桂冠戴在毛泽东头上。中国诗人郭沫若以《蝶恋花 答李淑一》为例，称赞毛泽东的诗词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却步”，是“古今的绝唱”（《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郭沫若，1958年7月《红旗》第3期），而胡适在1959年3月11日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却批评《蝶恋花 答李淑一》“没有一句通的”（《胡适日记》）。不少研究文章也指出毛泽东诗词抄袭引用了很多古人的诗句，但我认为毛泽东诗词也有好的。（这里套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讲话，毛说“党委书记，也有好的”。）

毛泽东诗词中的“党文化”语言与性格特征

毛泽东诗词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毛所写的诗词意境，格调，遣词造句水平反差极大，而且与诗词的创作时间毫无关系。我们把同样写于1927年的《菩萨蛮 黄鹤楼》与《西江月 秋收起义》比较一下，优劣立判。再把写于1961年的《卜算子 咏梅》与写于1963年的《杂言诗 八连颂》对比读一下，简直就不像一个人写的。毛泽东诗词中这种巨大的优劣反差，是由诗词的题材的差异所决定的：毛泽东诗词中凡是写心（理想），写情，写景的篇章相对优秀；写实，写事，作宣传的大多数诗词就显得粗劣。属于前者的具有代表性的诗词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菩萨蛮 黄鹤楼》，《卜算子 咏梅》，还有两首《沁园春》，《蝶恋花 李淑一》，《念奴娇 昆仑》，《浪淘沙 北戴河》，《水调歌头 游泳》等，全都是毛泽东生前亲自审定发表的。后者具有代表性的诗词有上述提到的《西江月 秋收起义》，《杂言诗 八连颂》，还有《如梦令 元旦》，《减字木兰花 广昌路上》，《七绝 为女民兵题照》，《念奴娇 鸟儿问答》等。

毛泽东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致陈毅》），但毛在自己不少诗词中明显违背了这一信条。毛的许多诗词的遣词造句想像贫乏，语言重复单调，有很多完全是政治口号式的词句。尤以“红旗”“工农”为其重复使用的形像化特征：“风卷红旗过大关”，“风展红旗如画”，“红旗漫卷西风”，“不周山下红旗乱”，“红旗卷起农奴戟”等等。这种简单化却具有鼓动性的语言特征和毛泽东竟然总结“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条，造反有理”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诗词中“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万”重复使用“工农”，重复使用数字“十万”“百万”“千百万”实在是缺乏诗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在这类政治口号式的词句里感受到毛泽东强烈的群众运动政治意识，这种政治意识体现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里，运用到后来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其诗词中（当然也包括他的文章中）创造的政治口号式的“党文化”语言系统，影响至深，一直延续至今。

撇开毛泽东诗词的优劣不谈，从毛泽东诗词中，我们可以一窥毛泽东的某些性格特征和品质。我们可以毛泽东处于逆境中写的《采桑子 重阳》，《清平乐 会昌》等这些

诗词中体会到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忍辱负重的勇气，不屈不挠桀骜不驯的个性。我们可以从《西江月 井冈山》“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中，看到毛泽东在他性格流露出来的处惊不乱的刚毅，毛泽东诗词中的“六月天兵征腐恶”，“天兵怒气冲霄汉”，用“天兵”来形容红军是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汉，体现了毛泽东造反有理，“山大王”（鲁迅语）打天下的气概。“不周山下红旗乱”更是引用共工与颛顼争帝怒触不周山的故事，显示自己与蒋介石争天下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毛泽东对政治对手赶尽杀绝的冷酷，在《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毫无保留地实施于行动上，不管是对蒋介石还是对知识分子，党内同僚。正是这些作为强者才具有的性格特征和品质帮助毛泽东克服艰难险阻，成功地登上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王位。

毛泽东诗词与其政治生涯

1929年，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失利，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并被自下而上落选前敌委书记，开始“养病”。1929年10月他写下了《采桑子 重阳》，其中的诗意虽然有类似曹操《龟虽寿》中对时间飞逝，壮心不已的感慨，诗词的艺术境界与曹操的诗却相差甚远，但与曹操不同的是，毛泽东毕竟才36岁，我们把毛泽东当时的政治境遇联系起来分析，毛泽东在这首诗中，“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不是春光。胜似春光”那种韬光养晦，蛰伏再起的志向却比曹操更胜一筹。毛泽东在1929年底得知自己被莫斯科内定为即将成立的红色政权首脑，开始借打AB团名义大开杀戒，镇压政治对手和反对他的红军战士。1930年9月第一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任主席。后来毛成为红军总政委，1932年宁都会议又被撤职，再次“养病”。这里要提一下的是，根据众多文献文章书籍记载，毛泽东当时确实生病，同时也确实在宁都会议后被迫“养病”或自己由于被排挤而请“病假”，但毛泽东却能善用“生病”或“不生病”作为党内斗争手段。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受排挤时请“病假”，但在博古为了怕毛泽东在长征前夕危难之际捣乱，向莫斯科提出让毛泽东去苏联看病时，毛泽东又说“我的身体很好，哪儿也不去”。毛在1934年长征前夕又差点被中共中央扔在瑞金。在这期间，红军与国民党的武装斗争节节失利。1934年夏天，毛泽东在《清平乐 会昌》中自注：“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但在这首词中，我们却找不到一丝“郁闷”，反而从《采桑子 重阳》中“人生易老天难老”的感叹变成了“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毛泽东在后来写的这首词的自注里表达的是红军武装斗争失利，被蒋介石的围剿逼得只能放弃原有革命根据地被迫长征，自己又在党内斗争中受排挤的郁闷，这是明白无疑的。这就很合理地解释了毛泽东在这首诗词的自注与其诗词巨大的情绪差别。与其多年后的自注截然不同的是，当时毛在这首诗词中表现的是对党内斗争游刃有余的自信，也许还夹带着由于把他排斥在外，当时的中共领导在军事上节节败退的奚落。这种自信体现了毛能屈能伸，深藏不露，善于权谋的性格。

既然我们已经论及毛泽东在这首词的自注中流露了长征的初衷，那么我们现在从毛泽东的诗词中来分析一下毛泽东对抗战的态度。毛泽东这一自注，很显然只是为了这首诗词的出版，写一个注解来说明当时政治形势和自己的心情，但是这一小小的自注无意中泄露了长征的初衷。这就像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时，主旨是评价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军事责任，并不是直接谈论为什么要长征，但也在无意中泄露了“红军被迫撤离，说是北上抗日。对外宣传这么讲，实质上是逃命。”的初衷。这种无意中的泄露，是不可能从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找到的。毛泽东生前身后官方权威出版社共发表了 67 首诗词，无论是抗日前还是抗日后，描写“抗蒋”的诗词比比皆是，而写抗日的只有一首《挽戴安澜将军》（1943 年），据董必武秘书牛立志证实这首诗还是董必武代笔的，这首作为董必武诗发表的标题是“代毛泽东同志挽戴安澜将军殉国”（《董必武抗战诗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牛立志 人民日报 2005.08.20 第 8 版）。毛泽东其实也没有惊人之美，这首诗是毛泽东身后 1983 年 12 月在《人民政协报》第一次发表的，毛泽东并不知道由董必武代笔的诗被人收入自己名下。这样看来，官方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中，除了董必武代笔的这首并不属于毛泽东的诗以外，没有一首是抗日的。1934 年毛泽东发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后，毛泽东在 1935 年 10 月长征途中写下了《清平乐 六盘山》，诗词中有“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下抗日了吧，偏偏毛泽东在日后作者自注中写出：“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时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又一次泄露了天机。毛泽东在这两首《清平乐》小小的自注中的泄露天机，是对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消极抗日，伺机保存实力，发展壮大的佐证。

毛泽东帝王情结与诗词

我在这里把毛泽东帝王情结放在诗词之前，是因为毛泽东帝王情结是源，诗词是流。我无意从毛泽东的诗词里揣测毛泽东的帝王思想，我们应该从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政治统治手段和这种政治统治手段下产生的社会政治结果来判断毛泽东是否有帝王情结，而毛泽东诗词中流露的帝王思想只是毛内心帝王情结的艺术表现。我认为，帝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里最关键最重要的灵魂。察其言：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多次自称秦始皇，说中国共产党“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历史学家茶座》2009 年第一辑）。

观其行：毛泽东无疑是一个革命者，他有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反对外来侵略，解除中国人民苦难，使中国强大起来的政治理想。在他的著作里，在他的自觉意识里，毛泽东也试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我把它称之为**原始革命理想**。但是我们纵观毛泽东政治生涯轨迹，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统治方式，可以发现毛泽东的**原始革命理想**是通过他自己成为唯我独尊，个人至高无上权力超过任何一个中国历代皇帝的专制统治方式来实现的，我把毛泽东深层意识中这一极端个人主义的理想称之为**终极帝王理想**。（毛泽东青年时代在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认为自己伟大，用伟人拯救世界的思想已见端倪。）

毛泽东在 1949 年以前，以其卓越的政治远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才能（打败蒋介石），外交手段（与斯大林，共产国际的关系，获得苏联资金援助，利用媒体宣传树立形象），深谋远虑的策略（党内斗争，利用抗日战争韬光养晦）夺取了政权，实现了建立新中国的原始革命理想。在这一阶段，毛泽东的**原始革命理想**与其**终极帝王理想**基本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冲突。1949 年以后，毛泽东当然不会满足自己只是一个打天下夺取政权的开国皇帝，他还要成为一个有辉煌政绩的帝王，这一目标与他的两个理想也是一致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始阶段，社会风貌，经济形势有了改善。毛泽东春风得意，提倡大鸣大放，要知识分子提意见，帮助中共“整风”。知识分子热血沸腾，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批评起“党天下”，讽刺“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毛泽东感觉到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知识分子要危及到他的统治地位了，他的**原始革命理想**和他的**终极帝王理想**发生了第一次重大冲突，毛马上抛弃了知识分子，发动了反右运动。

我们可以在毛泽东诗词中看到这两种理想冲突的存在和毛泽东的表现：1958 年，毛泽东开始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由于毛泽东搞经济远不如其搞政治这样得心应手，最后弄得民不聊生，彭德怀为民请命，被打为反党分子，毛泽东却还是在《七律二首 送瘟神》里颂扬自己的政绩“六亿神州尽舜尧”，有人歌颂这是毛泽东不以救世主自居，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是毛泽东对人民的充分肯定，其实这与毛欣然接受“毛主席万岁”这一称呼封建帝王口号时，回喊“人民万岁”完全是异工同曲之妙。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刘少奇在 1961 年中共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埋下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祸根。令人惊讶的是，毛泽东还是在同年写的《七律 答友人》中好大喜功大唱自己赞歌“芙蓉国里尽朝晖”。应当说，毛泽东搞大鸣大放也好，大跃进也好，本意是为了更好治理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希望中国人民幸福，这是与其原始革命理想是一致的，但是当这些实践失败，影响毛泽东英明领袖的声誉，怀疑毛泽东统治地位的时候，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抛弃他的**原始革命理想**以保全其**终极帝王理想**，哪管它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在所不惜。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正是这种冲突产生的典型恶果。中国史学界有个观点，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意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是犯了两个极其严重的错误：性质判断错误和采取的方法错误。这种观点是很有误导性的，开脱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严重罪行。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反驳西方学者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利斗争的说法，他认为，当时毛泽东的声望和权利无人能比，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就把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打倒了，对这一观点我非常赞成，事实也是如此，。既然这样，毛泽东至少不应该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方法上的错误，如果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所发生的种种罪行是错误的话，他完全可以用第二张大字报把让这些罪行銷声匿迹，但毛泽东没有这样做，就像毛泽东对待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的态度一样，毛玩弄着中国历代帝王式的政治手段（比如利用江青批周恩来与刘邦用皇后吕雉杀死韩信同出一辙。），把中国拖进灾难的深渊。毛泽东的这种严重分裂的表现只能用他深层意识中的帝王情结来解释。

讨论毛泽东诗词里帝王情结的文章很多，从 1945 年就开始争论至今，这里不再赘述。我们可以确定是，既然帝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里最关键最重要的灵魂，那么毛泽东诗词里的帝王情结是绝对存在的。

唐代诗人中，毛泽东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但对杜甫就不那么喜欢，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就像我们以上所论述的，毛泽东大多数的诗词其实也是政治诗，毛泽东的诗词与杜甫的诗主题相同，但表现的主体对象和观念却大相径庭。杜甫常为人民大众的苦与愁而哀吟，而毛泽东则多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帝王思想而咏叹。从诗的政治格局上来说，充满人本思想，政治才能匮乏的杜甫，当然不能与具有强烈帝王情结，政治才华横溢的毛泽东相比。难怪毛泽东要说杜甫是“哭哭啼啼的小地主”。毛泽东在早期诗词创作中所展现了对帝王地位的向往，和他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后前所未有的那种恣意妄为的帝王之气，这是前无古人的。毛泽东推崇的曹操虽然很想称帝，曹操的《观沧海》也只是抒发一下自己不能公开宣称的雄心壮志，在《龟虽寿》中展示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苦苦追求，最后生前也没能当上皇帝，哪像毛泽东在他的诗词中那两首《沁园春》里那样直言不讳的。《念奴娇 昆仑》里那种傲视天下的豪迈气魄，那种“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相赠世界的雄心壮志；《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里那种“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对于“九五至尊”的丰富想象，只能具有强烈帝王情结的毛泽东才能想得到，写得出，也是毛泽东诗词的独特之处。

成为像刘邦，朱元璋一样的，由平民出身登上帝王王位是毛泽东毕生的理想，对这种理想的热切追求，这是毛最原始最深层的欲望冲动。应该说，正是毛泽东的帝王情结激发了毛作为诗人的灵感，使毛泽东驰骋于天马行空的想像世界，写下了其诗词中最优秀的篇章。（《念奴娇 鸟儿问答》是个例外，毛泽东的帝王情结已经升华到要当世界领袖了，自我极端膨胀达到了恣意妄为的境地，什么词语都可以用进诗词中了。）

毛泽东诗词中的浪漫

毛泽东诗词中的浪漫主义表现在他抒发帝王情结的诗词里，也表现在他的很少几首的情诗里。《虞美人 枕上》是一首纯粹描写男女之情的婉约诗词，意境，形象，遣词造句都出色浪漫，在香港编《毛泽东诗词全集详注》的刘济昆，在《笑谈毛泽东诗词》里说这首词毛有“失恋感觉”。毛泽东喜欢女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方面的史料很多：从庐弘（伍修权女婿）《“红太阳”的影子》印证李志绥的书提到的李氏姐妹共伺毛的事实，可以证明李志绥的书虽有不附史实之处，但并非全是胡编乱造（庐弘与李氏姐妹不只是一般的熟悉，他们之间有长时间的多方面的交往。）从 Pantsov 和 Levine 收集的来自当时在延安的美国人的文章对毛泽东在延安谈情说爱的风波到丁玲回忆毛半开玩笑在她面前封赐三宫六妃的史实，从杨开慧“他一定是丢弃我了”的悲叹到章含之在美国之音采访中不得不承认毛喜欢年轻女孩子是“毫无疑问的”，都证明毛泽东从一个喜欢“谈情说爱的哲学家”，发展为一个登上统治者地位后的玩弄女性的现代帝王（womanizer），这种表现与他的帝王情结是完全相通的。对此论点当然

也有不少文章反驳，但大多都软弱无力，相比以上的真材实料，没有一篇有份量的。

毛泽东 1927 年 8 月中旬最后一次与杨开慧相聚后，10 月在井冈山与贺子珍相遇，6 月就与其结婚，有的文章说是毛泽东“误信”杨开慧已牺牲才与贺子珍联姻，实在太过牵强。（李慎明《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源于误信杨开慧已牺牲》，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10 月 23 日第 514 期。）后来毛泽东有机会把杨开慧和两孩子转移出来，他也没有做，其中原因我觉得特里尔（Ross Terrill）的说法是合理的，毛是因为“已经与贺子珍生活在一起了，他要避免原有的妻子与新婚的妻子彼此相遇。”毛泽东知道杨开慧死讯时，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贖”，可见毛内心对杨开慧的内疚之情远远超过对何键杀害杨开慧的仇恨之意，后来的《蝶恋花 李淑一》更是对杨开慧的内疚之情的进一步升华。Pantsov 和 Levine 先生在书中提到根据斯诺夫人的记载，毛泽东在贺子珍与吴光伟（Lily）争风吃醋后，被迫遣走吴光伟。吴光伟把“毛泽东在快乐时光写下，送给她的诗词付之一炬”。如果真是这样，对研究毛泽东诗词是一大缺憾，但我觉得这可能性不高，就算有那么几首诗词，也不会怎么出色。毛泽东博闻强记，对自己的得意之作，他会牢记，书写和珍藏。说到这点，我们不能不提一下毛泽东的《贺新郎 别友》。毛泽东对这首诗词的喜爱程度是超过任何他写的诗词之上的：被发现的手迹就有六件，早年抄写给丁玲，1961 年手书给卫士，1973 年又抄写给保健护士吴旭君让其好好保存，反复修改三次。但奇怪的是，毛泽东生前从未想过要将此词发表。彭明道 2001 年对这首词进行了详细考证研究（《毛泽东《贺新郎 别友》是赠给谁的》，《书屋》2001 第 2 期），证明这首诗词是赠给毛年青时代女友陶斯咏的。我认为彭文非常有说服力，至少这首词不是写给杨开慧的。除了彭明道所论述的证据研究之外，我在这里提供些资料，支持彭文的论点。史料显示，李淑一在长沙与杨开慧一直保持联系，1930 年 10 月，杨开慧被捕前还带信给李淑一，要李淑一在长沙帮她买文具（《谈笑人依旧 - 毛泽东与亲朋好友的交往》王爱枝）。毛泽东的这首词写于 1923 年，七年里有充裕时间把《贺新郎》给杨开慧，杨开慧也有大把时间与李淑一像谈《虞美人 枕上》一样，谈到这首词，但毛泽东与李淑一的通信中，只提到“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虞美人 枕上》），根本没有提到《贺新郎》，这只能说明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把这首词献给杨开慧。再者，毛泽东写过许多诗词赠予个人或与人诗词，除了一首《七律 答友人》外（那也是后来改的，原诗也是无题，后改为“答周世钊同学”，再改为“答友人”），全都指名道姓，其他诗词也都有标题，唯独这首《贺新郎》无名，无姓，无标题，1978 年 9 月 9 日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发表时，编辑只能用这首词的第一句“挥手从兹去”做标题，一直到 1996 年《毛泽东诗词集》增订本才有了标题“别友”，并在注释中说：“本词最近发现作者有一件手迹，标题为《别友》。”根据郭发明《哪篇才是《贺新郎 别友》词的定稿》考证（《百年潮》杂志 2001 年第 5 期），那是毛泽东在 60 年代加上去的。如果这首词是写给杨开慧的，按照毛泽东写诗词作标题的习惯，不写“赠杨开慧”也应该题为“别妻”“赠内”绝不会是“别友”。毛泽东在这样一首明显是写给女性情人的别离情词题目上的讳深莫测，自己非常喜爱却在发表意愿上的犹豫，是绝无仅有的。综上所述，《贺新郎 别友》绝不是赠给杨开慧的。毛泽东在《虞美人 枕上》与《贺新郎 别友》（初稿）里的那种魂牵梦萦的思念，缠绵悱恻的浓情的艺术表现，显示了毛泽东早期诗词中浪漫主义的婉

约和少有的温情，虽然是稍纵即逝的。这在毛泽东以后的，无论在他的诗词中，还是在他的性格里是很难发现的。这种变化体现了毛泽东从一个早年喜欢年轻漂亮女性，多情浪漫的革命家，到后来成为一个玩弄“三宫六妃”的帝王的转变。

结语

如果把毛泽东诗词与中国浩如烟海的中国优秀诗歌相比，无论是词藻音律，还是意境格调，都难以确立其诗词的**艺术地位**，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诗人可以凭籍其卓越的诗歌艺术奠定诗人的历史地位，诗歌也可以凭籍其诗人重要的历史地位奠定其诗歌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无疑是属于后者的诗人，众多毛泽东传记里毛泽东的诗人桂冠也是这样戴上去的。